"清代王朝与国家"笔谈

大清：一个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

常建华

本次论坛设定论题"如何认识清朝的国家性质？"我所理解的"国家性质"，即国家的国体及政体。就清朝国家而言，如从中国帝制历朝历代的连续性来说，一般表述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后形成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我想是不错的。当然，清朝有别于前朝之处也是存在的，这就是属于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满族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理解国家的民族结构、社会结构方面，人们也会引入阶级的分析，强调满蒙联盟、地主阶级、士大夫的重要性。然而，近二十多年来海外一些"新清史"学者格外强调清代历史内亚因素的特殊性，将清朝越来越经常地重新与辽、金、元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发生满洲研究视角的转变。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清朝的国家性质，下面首先概括"新清史"引发的清朝国家性质的争议，然后谈谈我的思考。

一、清朝是"内亚帝国"吗?

将清朝作为帝国早在晚清就已出现。清朝为了与西方列强抗衡，自称"大清帝国"。现代研究清史的早期学者如萧一山在《清朝通史》中也称清朝为帝国，由于与清朝同时期世界上还有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将他们的帝制比较也是自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出现的将清朝视为帝国具有不同的语境，需要认真予以分析。①

"新清史"将清朝作为"内亚帝国"，或曰"内亚清帝国"，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清是帝国吗？其二清是"内亚帝国"吗？

欧立德阐释了"新清史"的清朝"内亚帝国"认识。他指出："将满洲人看做清帝国的统治民众，这种新的视角意味着他们正在作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被重新载入各种历史叙事中，"它对理解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欧立德的基本观点是："满洲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因为其适应其他文化的能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保持了作为一个征服民族的特性；不只是因为满洲人以中原人的身份来进行统治，而且因为他们也是作为内陆亚洲人来实行统治的。因此，要理解满洲统治的重要意义，至关重要的是理解满洲人是谁，他们的政治、军事、法律机构是如何运转并如何合成为一种帝制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帝制视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的'帝制，而是应当看到它是清朝专有的，与世界其他前现代帝制有类似的政治

[收稿日期] 2021-02-20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changjh@nankai.edu.cn

① 参见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 年第 1 期。

体制。”[①] 这是种脱离汉族及中华本位的内亚“清帝国”论，也遇到有力的反驳。李怀印认为：“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②]

“新清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大清皇帝的多面性，认为：“对于清朝皇帝的身份形象不能仅仅用关于‘中国皇帝’的理解方式去思考，我们还应该将皇帝、汗和转轮圣王集于一身。……清朝的统治所建之于上的基础，实际上与传统的正统思想和权威相异甚大。例如，在强调清代皇权的普遍性（或说普世性）时，研究的重点之一就在于达赖喇嘛和清帝之间建立在宗教领袖和宗教庇护者的理念之上的关系。……这两者分别是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乾隆帝尤其注重这种形象的建立。大清皇帝是藏传佛教的最重要的资助者。”[③] 同样，学者对此的反驳也是强有力的。研究西藏史及蒙元史的学者沈卫荣指出：“所谓满族特性，或者内亚特性，实际上既不满族，也不内亚，它们指的无非就是西藏特性，而大清帝国统治之意识形态亦无非就是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所鼓吹的‘菩萨化身’或者‘转轮王’思想。”“我们不但看不出任何乾隆皇帝想要把藏传佛教当成其治国理念的意思，相反可以看出他极不愿意他的文武之治和十全老人形象会因他的藏传佛教信仰而受到损害。”“将俗世的帝王赞誉为出世的菩萨化现或者转轮王再世，这并不是清代的首创，甚至也不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现象，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大家都熟知连武则天都会在《大云经》中找到女菩萨转世，下凡为转轮圣王的预言，以此为其篡位称帝造势。因此，把清朝皇帝塑造成菩萨皇帝或者转轮王，这同样不能用来说明清朝帝制（或者说王权）拥有独特于其他朝代的内亚性质。”“从 11 世纪末、12 世纪初开始，西藏佛教历史书写中就经常把西藏称为观音菩萨的化土，把西藏的政教领袖认定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及至元末和元以后，西藏喇嘛们又把汉地的皇帝称为文殊菩萨的化现，把蒙古大汗称为金刚手菩萨的化现，形成了一种于佛教世界意义中的特殊的‘三圣’结构，分别代表慈悲（观音）智慧（文殊）和勇武（金刚手），以此将西藏、蒙古和汉地紧密连接在一起。……所以乾隆皇帝顺理成章地被西藏人、蒙古人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显然，不但把清朝皇帝塑造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并非满人自己的创造，而且这个‘菩萨皇帝’的身份认同从其本意而言也并不给予清朝皇帝以‘中国 [汉地] 皇帝’以外的更多的政治意义，甚至反而把它的统治地域限定在了汉地，因为西藏和蒙古分别是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化土，它们不是文殊菩萨管领的范围。”[④] 所以，清朝皇帝的多面性并不能支撑其为内亚帝国的身份。

我对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的考察也表明，新清史强调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接续元朝传统的看法可以商榷。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进香礼佛，以绥服信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清帝与五台山的联系点，在于清帝被藏传佛教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意味着正式承认清帝对中国的统治，而五台山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御书寺额、碑文、诗歌以及支持续修山志也是再造圣山。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是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的追求。[⑤] 康熙帝命令工匠制造珐琅器有华洋竞胜的原因存在，其自我有着中华意识。[⑥]

---

① 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9 页。

② 李怀印：《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历史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③ 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刘凤云等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第 11 页。

④ 沈卫荣：《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227、232、237–240 页。

⑤ 常建华：《祈福：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历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⑥ 常建华：《康熙朝珐琅器礼物与皇权》，《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清朝仍是中华体制下的朝代，如果说清朝是帝国，也是中华帝国而非内亚帝国，不过其国家性质在今天需要再思考。葛兆光指出："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的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①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重大的变迁，对于清朝国家性质需要重新认识。

二、清朝的"首崇满洲"与华夏复合民族

清朝作为满族建立并统治的政权，所谓"满族特性"其实不如"首崇满洲"的概括更加贴近满族统治者的政治意识。

顺治十年（1653）二月，皇帝到内院，览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条议《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一疏。顺治帝对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说：

>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夙昔满臣赞理庶政并畋猎行阵之劳，是用得邀天眷，大业克成。彼时可曾咨尔汉臣而为之乎？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②

也就是说，清帝标榜"满汉一体"，其实质仍是"首崇满洲"。

以往的清史论述已经注意到"首崇满洲"问题。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三章论述清朝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及早期的统治政策，第一节讨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的建立，第一个问题就是维护满族贵族特权的措施。戴逸指出：

> 清入关以后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是以入关前的政权机构、政治制度为基础，进一步采取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并努力保护满族贵族的特权。由满族亲贵垄断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拥有很大权力，其成员"皆以满臣充之"，"半皆贵胄世爵"，汉族官僚不能参与，体现了满族贵族在政权中的特权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初有"国议"之称，处理国家重大机密的军政事务，其权力远远超过汉族官僚所能参加的各种机构。……保证满族贵族特权的另一项措施是中枢机构中重用满族的贵族和官僚。虽然，越到后来汉族官僚的数量、地位、权力越加上升，但有清一代，满族贵族始终紧紧抓住中枢机关的权力，不使其旁落。……满族贵族不仅采取一定的机构和制度，把"首崇满洲"的特权地位固定下来，而且通过一些措施企图把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如世袭……八旗子弟与汉族子弟不同，并不专靠科举考试为仕进之阶。满族贵族在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时，总是极力把自己粉饰成代表整个满族的利益，极力保持民族的差别，提倡满族的衣冠、骑射、语言、文字等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满族贵族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标举和贯彻"首崇满洲"的民族统治的原则。③

我觉得这一论述抓住了清朝国家性质的本质，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所论证。陈力指出：清朝"从各个方面维持旗人集团的超国民地位，如在科举、入仕、升迁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满汉差异。这些政策虽导致了清朝社会形成满汉两极格局，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旗人集团的凝聚力与向心力"。④ 郑天挺先生分析了清代国家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权力分配，指出"保证满人在中央集权中的最高地位，是清朝统治者分配行政权力的总原则"。⑤

---

①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8–29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 72，顺治十年二月丙午。

③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 1 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80–184 页。

④ 陈力：《清初"首崇满洲"述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⑤ 郑天挺：《清代的国家机构及其特点》，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30 页。

探讨“首崇满洲”，涉及到如何看待清朝体制中的满蒙、满藏、满汉等多民族关系。我觉得日本学者石桥秀雄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他“把清定位为元、明、清三个连贯的统一王朝时期最后一个王朝，认为与其将清朝定位为征服王朝莫如将其定位为复合民族国家中的非汉族王朝，主张在与直至现在的中国的关联中给清朝定位”。[①] 皇太极“于 1636 年建立了与大明对等的复合民族国家大清国”，[②] 比皇太极建立帝国（包含“政治帝国”“观念帝国”“多民族帝国”的用语）[③] 恐怕更容易被人接受。大清早期的体制更多的是“参汉酌金”，[④] 而非“明确宣布他要建立一个帝国”。[⑤]“复合民族”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当然，清史研究中强调内亚因素，也可带来学术灵感。如清朝会更加重视武力的作用，并处理与文化的关系，卫周安教授的《清代战争文化》一书就是一种尝试。不过，中华文化中强调的“文武之道”本来就要求人们在文武之间取得平衡，而不能偏颇。在帝国比较史研究中，欧美学者认为清朝属于中华本位者也是存在的。英国学者芬纳《统治史》认为：“满人的征服带来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个是满族部落成员拥有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种种特权；第二个变化更为重要，那就是至少到乾隆退位时，满清的皇帝使政府体制更加富有活力，运转更加有效，这是前所未有的。18 世纪的清王朝真正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传统的巅峰，它从最大程度上综合了儒家社会、信仰和政治制度。”[⑥]

前述论及清朝非内亚帝国问题，不过帝国的理论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清朝的中华本位问题。我曾呼吁加强对清朝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清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清朝的政治体制是传统政治体制的集大成。其次清朝政治体制是满族联合蒙古族征服汉族后建立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大量注入了非汉民族的成分。或者说清朝政治体制具有多民族联合的特点。再次清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变革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晚清为传统政治体制近代化的滥觞期；另一层意思是指清朝前期康雍乾时期的改革，尤其是雍正帝的改革影响巨大。[⑦]

三、大清的中华皇朝属性

将清朝国家的属性定位于中华而非内亚，主要是基于清承明制。以往的明清史大家孟森、郑天挺等先生对于清承明制都有过论述，同时也强调满族统治的特色。郑天挺先生成书于 1962 年的《清史简述》论述清朝沿袭明制和保证满族地位的政治，也指出清与明不同的主要是八旗制度还有内务府。[⑧] 我也指出清帝向明太祖吸取统治经验，学习《洪武宝训》《明太祖本纪》等书，总结他的开国谋略，并编修清朝皇帝的圣训，清朝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政治纲领，受到明太祖政治的很大影响。“清承明制”不仅只是清朝各项制度基本承袭明朝，而且强调这种政治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借鉴了乾纲独断的专制集权思想与政治体制，集中体现在“君权”与

---

① 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序言，杨宁一、陈涛译，张永江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 年（日文原版出版于 1995 年），第 4 页。

② 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序言，第 4–5 页。

③ 裴德生编：《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 年上卷）》第一章，戴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53–71 页。

④ 叶高树：《“参汉酌金”：清朝统治中国成功原因的再思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 36 期，2006 年 12 月。

⑤ 卫周安：《清代战争文化》，董建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9 页。

⑥ 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第 3 卷，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英文版出版于 1997 年），第 75 页。

⑦ 常建华：《加强对清朝政治体制的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

⑧ 郑天挺：《清史简述》，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 271–276 页。

"相权"关系以及宣讲教化方面。[①]

为了理解清朝国家的属性，我们尝试从其对于自身的称谓上加深认知。

首先从满文资料考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201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属于新资料。我观察到：

> 关于清朝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译编》中确实没有使用过"中国"、"中华"的词汇……但是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差不多。
>
> 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译编》有29件寄信档或附件出现了"天朝"一词。用法有天朝之人、我天朝、恭顺天朝、归顺天朝、天朝体统、天朝之尊、天朝与外藩、天朝所遣等，使用最多的是"我天朝"如何如何，与"天朝"同时出现称乾隆帝则曰"大皇帝"、"大圣主"、"圣主"。"大圣主"为赞美之词，"天朝"代表国家，"大皇帝"则是本国与朝贡者共主的意思，也有统治天下的含义。……
>
> 我也不否认清帝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带来的统治的多样性，满文档案的确可以解释历史的这一方面。清帝强调敬天法祖，敬天包括祈雨等仪式。无论是清实录，还是在会典当中，都记载了清帝实行中国传统雩祭礼祈雨，满文寄信档则记载了乾隆帝利用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祈雨祈晴办法，如任用回人尼咱尔布库尔等，也采取汉藏佛教的大云轮经，或设坛祈祷，还派阿哥行礼祈祷。乾隆帝的祈雨、祈晴措施，兼用汉、蒙、回等，具有少数民族皇帝体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性。不妨推论，乾隆帝多用蒙（佛）回之法祈雨、祈晴，或许认为其法术更为灵验。[②]
>
> 《译编》还有大量关于使用满文的记载，体现出满语的政治性与清朝的统治特色。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③]

这些的确构成了清朝的特色，但是并不能否定其以中华为本位。

其次，利用汉文的资料考察清朝的属性。我们考察一下清廷对于中国传统朝代自称"王朝""皇朝""皇清"的使用情况。检索《清实录》可知："王朝"的使用并不多，只有6条，计顺治十七年七月，命大学士李霨撰《明死节太监王承恩碑文》表于其墓。文中称中官"虽云食禄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责望之者。"[④] 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遣翰林院侍读春山等，致祭故安南国王黎维祹兼敕封故国王嗣黎维祜为安南国王。敕谕曰："王朝布化，万邦抒藩翰之忱。"[⑤] 以上两条的"王朝"都是朝廷之意。所余4条为乾隆朝的，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新帝饬外臣各以实政陈奏。谕曰："先王之礼，甸服者日祭、侯服者月祀以其地至近，本各有职事于王朝。"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周官王朝之狱讼，虽乡遂都家公邑之士分掌之。"[⑥] 这两条说的是周礼中的"王朝"。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月《御制再书安南始末事记》曰："兹黎氏实因天厌其德而自丧其国，而阮惠以获罪王朝，震悚悔过求降，并请诣阙乞封。"[⑦]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敕封缅甸国长孟陨为国王。制曰："朕惟德孚柔远，王朝隆无外之模，忱切向风，属国被咸宁之福既敬，将夫职贡恳备遐藩。"[⑧] 这两条均为对于有朝贡关系的藩国自称"王朝"，意为宗主国大清。

"皇朝"一词在《清实录》中始见于乾隆朝。乾隆十四年二月，谕金川土司莎罗奔："至尔

---

① 常建华：《明太祖对清前期政治的影响》，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参见常建华：《乾隆帝祈雨祈晴的多民族性》，《紫禁城》2011年第5期。

③ 常建华：《从"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的史料价值》，《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

④ 《清世祖实录》卷138，顺治十七年七月辛巳。

⑤ 《清世宗实录》卷140，雍正十二年二月乙丑。

⑥ 《清高宗实录》卷5，雍正十三年十月丁卯、戊子。

⑦⑧ 《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戊申；卷1356，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壬戌。

等之地，皆皇朝之地；尔等之人，皆皇朝之人。”①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谕中谈到“朕前此《御制皇朝礼器图序》”。② 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国子监奏：“臣等办理监务，留心搜访积有岁月，拟恭纂《皇朝太学志》。”③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谕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④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谕曰：“三通馆进呈《皇朝通志》职官略一门，朕详加披阅。”⑤ 五十一年闰七月，礼部内务府遵旨会奏：“再恭查《钦定皇朝礼器图式》。”⑥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谕曰：“再著驻扎各回城大臣，晓谕各处回子云：从前准噶尔侵扰尔等回子，种种虐害，尔等困苦难堪。仰赖皇朝威福，荡平准噶尔，尽革其旧时苛政。”⑦ 乾隆六十年八月，敕谕南掌国王召温猛曰：“朕惟大畏小怀，列辟凛尊亲之戴；薄来厚往，皇朝隆赉予之施。”⑧ 上述 8 条中,5 条为乾隆时期编纂的图书书名中出现“皇朝”，意为清朝。3 条是皇帝对于土司、回部、藩国时自称“皇朝”。

乾隆朝以后的实录出现“皇朝”一词，都是在书名当中。嘉庆朝“皇朝”出现 4 条，2 条是《皇朝词林典故》成书事。⑨ 另外分别提到《皇朝文献通考》⑩《皇朝通礼》。⑪ 道光朝 1 条，谈到《皇朝文献通考》。⑫ 光绪朝 1 条，提到《皇朝通典》。⑬ 宣统朝 4 条，分别提到《皇朝通典》《皇朝通志》。⑭2 条提到刘锦藻所纂《皇朝续文献通考》书成。⑮

类似“皇朝”的还有“皇清”一词。“皇清”出现在《清实录》也始于乾隆朝，有 12 条。有 3 条是出现在书名，如乾隆六年三月，提到《皇清文颖》。⑯ 其余 9 条中 2 条是“皇清”，即乾隆八年十月东巡盛京,《御制盛京赋》曰：“帝眷东顾，用畀皇清而为万载之沛丰。”⑰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御赐大学士嵇璜诗有“丝纶盛事纪皇清”之句。⑱ 另外 7 条以“我皇清”出现，计乾隆十四年二月,《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曰：“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轴；函括万邦，悉主悉臣。”⑲ 乾隆二十年十月,《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曰：“搢绅之儒守和亲，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则民力竭，和亲则国威丧。于是有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兴矣。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天之龙，兴东海，抚华区。”⑳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谕曰：“准噶尔一事，自用兵以来，伊犁既已荡定……而自古未通中国之哈萨克亦皆称臣纳贡，其于我皇清疆宇式廓，万年久安之道，为有益，为无益，朕亦不更置论。”㉑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曰：“惟我皇清，抚有华夏。”㉒ 乾

---

①② 《清高宗实录》卷 335，乾隆十四年二月丁未；卷 760，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巳。

③ 《清高宗实录》卷 795，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己未。

④ 《清高宗实录》卷 919，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258，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庚戌。

⑥ 《清高宗实录》卷 1261，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癸巳。

⑦ 《清高宗实录》卷 1323，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癸丑。

⑧ 《清高宗实录》卷 1483，乾隆六十年八月癸未。

⑨ 《清仁宗实录》卷 153，嘉庆十年十一月丁卯；卷 206，嘉庆十四年正月乙丑。

⑩ 《清仁宗实录》卷 212，嘉庆十四年五月辛巳。

⑪ 《清仁宗实录》卷 345，嘉庆二十三年八月戊子。

⑫ 《清宣宗实录》卷 27，道光元年十二月辛巳。

⑬ 《清德宗实录》卷 27，光绪二年三月壬寅。

⑭ 《宣统政纪》卷 9，宣统元年闰二月甲申；卷 22，宣统元年九月乙亥。

⑮ 《宣统政纪》卷 32，宣统二年二月壬寅；卷 45，宣统二年十一月丙寅。

⑯ 《清高宗实录》卷 138，乾隆六年三月丙寅；卷 298，乾隆十二年九月庚寅；卷 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庚午。

⑰ 《清高宗实录》卷 202，乾隆八年十月庚戌。

⑱ 《清高宗实录》卷 1352，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己未。

⑲ 《清高宗实录》卷 335，乾隆十四年二月甲午。

⑳ 《清高宗实录》卷 499，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

㉑ 《清高宗实录》卷 555，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午。

㉒ 《清高宗实录》卷 600，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

隆四十九年七月，《御制迟速论》曰："胜国之兵……文臣掣肘于中，武臣作伪于外，其君付之不问。弗如是，则我皇清何以得有明之天下乎？"[①] 乾隆五十年二月，《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曰："予敬以是告子孙，以保我皇清万年之基也。"[②] 乾隆六十年十月，谕皇太子、皇子、军机大臣曰："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嗣皇帝仔肩重器，惟当效法祖宗及朕敬天爱民、法祖勤政，勉承付托，此即孝之大者。"[③] 作为自称的"我皇清"，通过"中夏""华区""中国""华夏"相关，歌颂清朝的文治武功，但也表达了中华本位之意。即如乾隆六十年讲到皇位继承制度"皇清之制与汉姓殊"，但治国要求嗣皇帝"惟当效法祖宗及朕敬天爱民、法祖勤政"，奉行的是祖宗家法实质是中华治国纲领。[④]

乾隆朝以后"皇清"一词出现条数大为减少，其用例不出乾隆朝的。嘉庆朝"皇清"一词出现 3 条。嘉庆十年（1805）八月，《御制盛京颂》首句"天佑皇清"[⑤]。嘉庆十一年四月，谕内阁谈到"御史叶绍楏奏请续编《皇清文颖》以光文治一折"。[⑥]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御制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曰："天作皇清"。[⑦] 道光朝"皇清"出现 2 条，道光二年（1822）七月，谕内阁恭建万年吉地工程一事说到："实为我皇清万世无疆之福也"。[⑧]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谕内阁录校《皇清开国方略》全函进呈御览。[⑨] 光绪朝出现 1 条，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江苏学政王先谦奏"刊刻《皇清经解续编》蒇事"。[⑩]

通过考察《清实录》使用"王朝""皇朝""皇清"三词的情形，可知"王朝"是中国古代一般性的传统用法，清朝顺治、雍正、乾隆实录亦曾使用。"皇朝""皇清"二词均开始于乾隆朝，并取代了"王朝"的使用，但是"皇朝""皇清"特别是"皇朝"在乾隆朝之后逐渐淡出。显然，"皇朝""皇清"用语在乾隆时期受到特别重视，这与当时清朝进入全盛，为了标榜文治，编修大型国家图书用于书名，显示武功（平定金川、准噶尔、回部），多在纪功颂扬文字出现。特别是对外关系时的使用，蕴含朝贡关系的宗主意味。"我皇清"与满文中常出现的"我天朝"一样，抒发了内心的崇高、庄严与伟大情感。本来"皇"字意为"大"，"皇清"与"大清"同义，但是"皇"字蕴含着比"大"更大的意思，也与皇帝制度相连接，实与乾隆朝的强盛、盛大相合。同理，"皇朝"与"王朝"同义，但是"皇朝"比"王朝"之意更为强大，况且在朝贡体制下藩属国才是"王朝"，而宗主国理当是其上的"皇朝"。当然，"皇朝"的用语并不是清朝的发明，明朝就普遍使用，如《皇明祖训》《皇明条法事类纂》《皇明经世文编》等，明之前尚有南宋人所作《皇宋十朝纲要》《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此外"皇唐""皇汉"的用语也存在。所以清朝使用"皇清"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帝制传统，不过"皇清"一词盛行于乾隆时代，又有着清代的历史背景。在朝贡体制下，宗藩关系容易理解为帝国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皇朝"为帝国，亦未尝不可，中华帝国在相当程度上是如此理解的。但是，中华本位的帝国又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因此，将清朝定位于中华皇朝，个人觉得更符合历史情形。

综上所述，我认为清朝国家的性质似可表述为首崇满洲的复合性中华皇朝，或许较为恰当。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210，乾隆四十九年七月甲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224，乾隆五十年二月丁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

④ 常建华：《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清朝政治纲领的研究》《论清朝以孝治天下的政策与其归宿》，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⑤ 《清仁宗实录》卷 149，嘉庆十年八月丙午。

⑥ 《清仁宗实录》卷 159，嘉庆十一年四月丙申。

⑦ 《清仁宗实录》卷 346，嘉庆二十三年九月戊戌。

⑧ 《清宣宗实录》卷 38，道光二年七月丙戌。

⑨ 《清宣宗实录》卷 472，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乙巳。

⑩ 《清德宗实录》卷 258，光绪十四年八月庚辰。